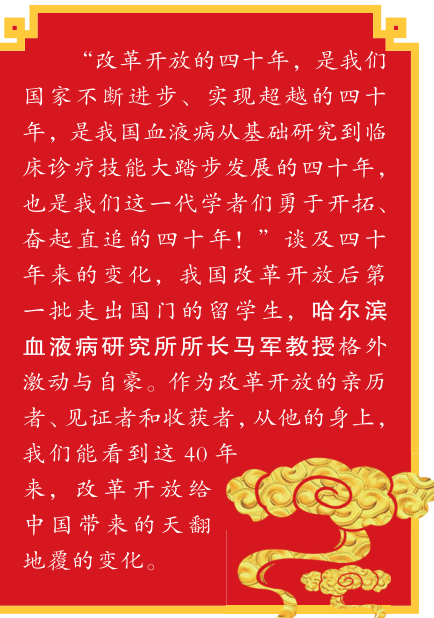




哈尔滨血液病研究所所长 马军 “哈尔滨方案” 点亮希望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贾薇薇



痛定思痛 开启我国血液病诊疗新局面

1970年，马军被分配至哈尔滨市第一医院血液研究室工作。“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老一辈的专家教授悉心教导我，指引我走上血液病研究的道路。”马军介绍。

1978年，国门打开后，马军作为第一批远赴国外的留学生到日本攻读血液学。“到了日本，当我看到实验室那么先进的检测设备，那么漂亮的国际化、规范化病房，真是当头棒喝，非常震惊！在我们还只有十几张病床、最大的实验室设备就是显微镜、只能进行简单的白血病形态学诊断的时候，日本医院的实验室、病房规模都达到了国际水平，并且已能够开展免疫学、遗传学等先进的白血病诊断技术。我的内心五味杂陈，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马军回忆起刚到日本时的情景。

在痛心之余，马军下定决心要将先进的血液学诊疗技术带回中国。经历了4年的潜心学习，1982年，马军回国，

和他一起走回国门的还有先进的造血干细胞研究技术和试验设备，他开创了中国造血干细胞相关临床基础研究的先河。

“一同回国的学者在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和哈尔滨五个地区同时开展了造血干细胞研究。我负责哈尔滨地区，并为实验室配备了二氧化碳培养箱、血细胞计数器、免疫分析仪、血小板功能仪等当时先进的设备。”马军表示，1982-1986年是我国造血干细胞临床基础研究的飞速提高期，数年时间，马军培养了16名博士、40余名硕士，并联合各地区研究所，将造血干细胞研究技术推向全国，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研究结果相继发表于国际顶级杂志，直追国际水平。

1986年，马军成功完成了首例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打开了造血干细胞领域临床实践的新局面。

M3型白血病治疗的“哈尔滨方案”

20世纪70年代初，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韩太云药师在民间赤脚医生的启发下，提取“毒药”砒霜（主要含三氧化二砷）的主要成分，用于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M3型白血病）。

“最开始是肌肉注射，但是会形成大出血。有一位患者自行进行了静脉注射，歪打正着，此后就开始了静脉注射。患者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啊！”马军感慨。

作为该项临床研究的参与者之一，马军表示，此方法一经推出就引起轰动，被称为“哈尔滨方案”，也是治疗M3型白血病的金标准方案。当时开始治疗的第一组患者，至今都还存活。

目前，此方法的治愈率已达92%，而哈尔滨血液病研究所是全球接诊此类患者数量最多的中心，已超过8000例。

“这是中国对世界治疗恶性肿瘤的一个典范贡献，应该感谢韩太云药师、张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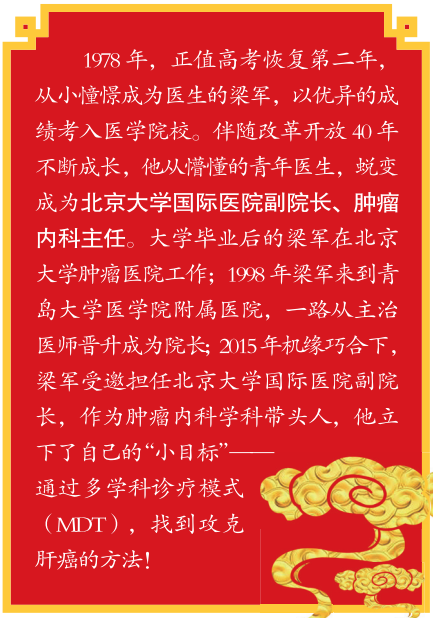
栋、孙鸿德、金镇静、徐敬淑、张鹏教授等哈尔滨小组的老一辈学者。”马军表示。

谈及目前东北地区血液病领域的发展现状，马军惋惜地表示：“虽然目前东北地区的血液学发展水平与国内整体水平基本相当，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东北的人才流失，年轻人更多的走向了‘北上广’等大城市。”

即便如此，马军对于血液学的未来依旧充满希望，“不过我们留下了，我们这一代人还能够再继续培养更多的学生，总会有人愿意留下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做医生首先要有一颗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责任心，还需要有长久的科研耐力，去突破临床瓶颈。未来的血液学领域将是多学科协作的大平台，年轻医生要在传承、发扬老一辈专家优点的基础上，闯出自己的路，争取在国际血液学平台的发言权，早日实现赶超！”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副院长、肿瘤内科主任 梁军 山东大汉的肝癌“小目标”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陈惠 实习记者 史郁松



“EACH研究”打破肝癌晚期治疗僵局

身为综合医院肿瘤中心主任的梁军，涉及肿瘤研究范围很广泛，偏好肝癌研究的他，分享了一个热血沸腾的故事：

10年前肝癌由于缺乏有效的内科治疗手段，始终处在一种窘迫境地。彼时，国外“索拉非尼”的靶向研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面对这种现状，踌躇满志的梁军全身心地投入到肝癌研究中来，可惜一段时间内毫无进展。“我的‘老大哥’秦叔逵教授打破了这一僵局，开展了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肝细胞癌系统化疗临床研究——‘EACH研究’。”

梁军第一时间参与该研究，“我非常骄傲成为秦教授团队中的一份子，同优秀的同道齐心协力地展开科学、缜密的肝癌治疗研究。”

“EACH研究”首次证明多个药物的系统化疗治疗肝癌安全有效，为晚期肝癌患者带来病情控制和生存获益的同时，还

可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每每谈起“EACH研究”，梁军仍难掩兴奋，“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研究之一，揭盲的结果令我们欣慰，特别是看到肝癌晚期患者通过此方式，取得总生存期的进步，生活质量得到改善！”该项研究结果为中国、亚太乃至世界其他地区进一步探索肝癌化疗提供宝贵的循证医学依据，这是团队的力量！

“10年后的今天，肝癌内科治疗已初现曙光。”梁军眼底的阴霾一扫而光。肝癌的发病原因、发病机制复杂，不能单一强调局部或全身治疗。因此倡导MDT的理念十分重要，“只有外科、内科、放疗等手段相结合，才能共同构成肝癌治疗的‘主旋律’。”

肝癌的防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以严谨的科学作风来开展科学研究。“我相信终有一天人类将找到攻克肿瘤的方法，我坚信抗癌的道路上洒满阳光！”梁军对此信心十足。

科学研究是创新发展的动力

“我的研究，得益于几代人的培养和教育。”深谙科学研究是创新发展动力的梁军，担任起新角色——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科教副院长。

有人说，现在做科研越来越难，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越来越庞大，梁军的回答很干脆，“我不认为科学研究与临床实践是脱节的，临床中发现的问题，如何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非常重要。医疗是主体，没有科研我们飞不高，

没有人才培养，我们走不远，科研促进医疗和教学的发展，是医院发展的重中之重。”

“我非常敬佩现在的青年医生，他们学习能力、学识水平都很优秀。应培养他们良好的工作技能，并进行科研发展方向的培养。”梁军认为科研发展方向的确立不仅依据临床工作中疾病的需求，更要与医生本人的兴趣相结合。梁军说：“将科学研究、临床诊疗和教学相结合，是全面发展的医疗工作者应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每个步伐都是宝贵的财富”

临床医生成长之路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唯有耐得住寂寞，才能肩负起患者生命的重担。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到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再到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梁军始终走在攻克肿瘤的道路上。谈及肿瘤医生的成就感，他感慨万千，“光阴沉淀30余年，我从默默无闻的年轻医生，成长为为患者排忧解难的肿瘤专家，成长的点点滴滴记忆犹新。接触不同的同事，遇到不同的老师，他们对我的成长起到很大帮助，这个过程，提高了我的工作水平、

培养了我的科研能力，这些不同的经历令我快速成长。我可以自豪地说，每个步伐都是宝贵的财富！”梁军一步一个脚印，他将每个阶段的研究成果落实在患者身上，看到患者因此受益，他感到自己做了一件令人快乐、满足的事情。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青年医生是医学的未来，肩负国家重任，“我提倡老中青三代相互结合，取长补短。”此刻的梁军期盼青年医生在医疗工作中早日挑起重担，让肿瘤事业后继有人！